

---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宋史研究论著集成  
(1900—2010)

日本编·桑原鹭藏卷

吕变庭 主编



科学出版社

---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宋史研究论著集成  
(1900—2010)

日本编·桑原鹭藏卷

吕变庭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研究备受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关注，而京都学派的研究更是表现突出，并赢得了汉学界的无比尊重和关注。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桑原鹭藏，主要从事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他生前出版的著作虽不多，但他的学术造诣非常高。桑原鹭藏主张要科学地研究历史、丰富地占有史料和严密地考证，这为他赢得了“精致坚实的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美誉。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仅被日本学界所推崇，近现代的各国汉学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也会时常参考和引用他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桑原鹭藏的表现与众不同。他的历史观、中国观等很多方面与同时期的京都学派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本书通过对桑原鹭藏的中国观、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中国区域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出桑原鹭藏在学术研究上十分严谨、不断追求真理的特点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通过与同时期京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进行比较和分析，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示这位近代东洋史学家的学术研究特点。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宋史研究论著集成：1900—2010. 日本编. 桑原鹭藏卷 / 吕变庭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03-060668-6

I. ①2…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宋代 IV.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7439号

责任编辑：王 媛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黄华斌

联系电话：010-64011837

电子邮箱：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1/2

字数：457 000

定价：16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本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曾瑜 邓小南 包伟民 朱瑞熙  
李华瑞 张邦炜 葛金芳 程民生

领导小组：

组 长：杨学新  
副组长：王晓龙 吕变庭 李金闯

编委会主任：姜锡东

编委会执行主任：吕变庭

主 编：吕变庭

编委会委员：

王善军 王瑞来 方 健 石立善  
平田茂树（日） 吕变庭 刘金柱  
何忠礼 汪圣铎 陈 峰 胡宝华  
姜锡东 韩 毅 游 彪 虞云国  
魏天安

编纂办公室：肖爱民

团队成员：

丁建军 王青松 王茂华 王晓龙 王晓薇  
王菱菱 吕变庭 刘金柱 刘秋根 刘云军  
刘明罡 闫孟祥 李 殷 李金闯 肖爱民  
邵育欣 张春兰 张 婷 张 勇 杨 帆  
周立志 姜锡东 贾文龙 贾芳芳 郭志安  
唐 晔 梁松涛 廖 寅

翻 译：冯赫阳

本卷执行副主编：

马晴晴 牛晓旭 吴长富

# 日本东洋史研究及宋史研究略论

——以近藤一成教授为例（代序）

日本学习院大学 王瑞来

日本的宋史研究，甚或是中国史研究，从学术风格与研究倾向上看，在 20 世纪，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比如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这样对中国史的整体观察，到宫崎市定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可以视为宏观考察。不过，包括宫崎市定在内，还有周藤吉之、中岛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郁等学者，已开始向微观转化，专注于制度的考证与复原。正如“唐宋变革论”对海内外的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一样，20 世纪日本学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极显功力，值得报以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这样的研究，为此后的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前提。

近藤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受这样的训练，成长起来的。因此，近藤的史料解读功底坚实，堪称其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制度史的训练，构成了近藤的研究根基。可贵的是，近藤虽承制度史研究之余绪，但并未墨守一家，而是作为一种优势，在宏观的大视野下，得到了长项发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学风转向，近藤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宏观—微观—宏观，这样的模式归纳，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在我看来，内藤湖南时代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基本上属于建立在部分实证基础上的推论，所以会有后来为数甚伙的论证。而在经历了细密微观的制度史研究之后的宏观，则是基础坚实的构筑。准确地说，这样的风格应当称之为宏微相济。

恩格斯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我想，在处于学风转变中的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可以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近藤。现在，在日本学界活跃的，已经多为近藤的学生一辈的学者。他们当中，很少有专注于制度史研究的。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在客观上缺乏严格的制度史研究的训练，难以为之，因为引导他们的老师一辈，已经显现出摆脱制度史研究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遗传给了下一代学者。从主观上看，得益并享用前辈学者制度史研究成果的新一代学者，已不满足于章句考证似的订短之学，而是渴望更有高度的创新。

一般来说，年轻人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方法、也易于接近新学风，但出生于战后1946年的近藤，却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学风转变的领军人物之一，实属难能可贵。我认为这与近藤的知识结构有极大关系。近藤的英文，在他那一代日本学者中，是少有的好。这便使他可以直接关注到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可以分析和利用其研究成果，在学术方法上接受启发。

平心而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并不十分重视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甚至在史料解读方面还带有些许藐视，所以在《剑桥中国史》已有了几种中文译本的今天，重视信息情报的日本，居然没有日文版出版。由于近藤是少有的重视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日本学者之一，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一年，认真归纳，写出了《英国的中国学》长文。此文后来由我译成中文，介绍到汉语学界。

广阔视野，细密的制度史训练，形成了近藤的研究特色。这就是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以小见大。看似寻常的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在近藤那里，都被加以深刻思考，不仅分析得入木三分，还由此及彼，对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置于大背景，给出大投射，引发大关注。读近藤的文章，尽管是小题目、小考证，却每每能获得大启发。

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都有中国学者难以企及的长处。那便是，他们的头脑中，首先有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在他们研究中国史时，这无疑便成为一个难得的参照系。这就像许倬云先生说过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就是全部；而对于外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以世界史的视野看中国史，自然观察的广度与视角较之仅据中国史的观察大有不同。立场与角度，方法与视野相连。而思维方式，又与接受的理论与训练而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有人说，研究中国，外国学者是站在窗外看中国，有宏观视野，但往往略于微观；中国学者则是在房间内看中国，纤微毕见，却缺乏宏观的方位感觉。然而在我看来，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日本学者却不一样，他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多数学者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体察。

作为日本学者，近藤既有毫不逊于中国学者的史料解读功底，又有独特视角，还吸收了欧美学者的理论与思辨之长，这使他能够在学术上高屋建瓴，承前启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世界史的视野是何等的重要。就是说，中国史研究者从视野到操作都应对空间畛域有所突破。

似乎与当代科学的分科细密相应，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断代研究如同过去专守一经，各划畛域，井水不犯河水，不越雷池一步。这无疑是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在日本学者那里，尽管在研究范围上也有大致的断代划分，但并不十分严密。20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我经常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宋代史研究会上，经常可以看到研究唐史或研究明清史学者的身影。不仅是研究者个人拥有跨领域汲取启发的愿望，学会的组织者也在做混同疆域的努力。比如，宋代史研究会就曾分别与隋唐史研究会、明清史研究会合办过年会。打破断代疆域，力求在时间畛域上的超越。在扩展研究时空方面，日本学者大都不会自设文史之限，许多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也会参加宋代史研究会，可谓文史不分家。这样的时空视野，既反映了日本多数学者的求知渴望，也是研究组织者引导的结果。

以宋史研究而知名的近藤，由于视野广阔、不专守一经，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所以，他不仅连续两届担任日本宋代史研究会的世話人（相当于会长），还担任过相当于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的议长。

近藤一成先生不但时空视野广阔，还对研究前沿保持着敏锐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电子技术的进步，给研究环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在一次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典籍的电子化，将能够查询参考的史料戏剧性地推向扩大，大大改变了工具书的概念。在二十年前，学生将《四库全书》取代辞典放在书包里携带的事，是谁都不曾想象过的。在读书会上遇到疑难之处，通过电子文献查找语汇用例，已成为常识。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

的确，面对新的研究环境，历来提倡的皓首穷经，令人欣羡的博闻强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研究上的突破，需要在方法与思辨上找出路。关于这一点，近藤就制度史研究，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对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平面的复原，应当深入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探索制度产生的过程与必然性，并进一步对当时社会中制度的实际机能进行动态的研究”（梅原郁《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的书评，2008年）。从静态的复原走向动态的研究，不仅是研究方式的转变，更可以说是认识论上的一场革命。

在上述的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上，近藤还讲到了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动向：“现在，年轻一代研究者的研究正在进入这样的阶段，即不仅仅依赖既有的文献史料，而是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手段，通过社会调查或现地收集史料这样的田野研究方式，构筑独自の史料群来展开历史研究。”对此，我知道，近藤讲到的年轻一代研究者，指的正是他的学生。近藤的学生也上过我的课，我清楚他们在近藤的训练下史料解读功底在同辈之中的佼佼程度。他的学生们呈现出新的研究势态，实在让我欣喜。说欣喜，是因为我对年轻一代研究者普遍感到失望。

在知识结构上，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年轻的一代似乎缺乏基础训

练，研究面过于狭窄，大多只守着硕士或博士论文一点。一点之外，由于缺乏关心，甚至导致了常识性知识的不足，从而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在那次早大的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之后，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接着近藤上述的话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科技进步，研究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电子版的产生，改变了工具书的概念，把博闻强记留给了电脑，我们不必花工夫去皓首穷经，资料性的考证也不再是学问。这一新局面，为我们提出了新课题。一是呼唤基本功的训练。对古汉语阅读能力的要求，对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复活。二是呼唤新方法新思维。电脑代替不了人脑。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永远是历史学的灵魂。没有思想的历史学，便是王安石讥讽过的（断烂朝报）。”

在近藤的引导下，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态势，让我消除了一些失望。薪火相传，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新锐研究者或许会成为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我期待着，也感谢近藤的育才贡献！

## 出版前言

相互交流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条件，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自创建以来，漆侠先生及其后继者都始终秉承开放、交流与合作的传统，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外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漆侠先生曾先后应邀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库，新加坡国立大学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兄弟院校、图书馆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为加强国内外宋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相互交流的方式有很多，除了访问、讲学之外，把国外宋史学者的研究论著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

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开汉学（指对中国文化）讲座以后，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士、荷兰等国家纷纷仿效，汉学研究者日渐增多，遂使“汉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进入20世纪，日本、西欧、美国在汉学研究方面鼎足而立。在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于1906年正式成立。1929年，日本又设立了京都研究所。1938年，京都研究所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该所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宗旨，下设经学与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天文历算、考古学等6个研究室，代表人物有内藤湖南、高濂武次郎、狩野直喜、松本文三郎、桑原鹭藏、矢野仁一、新城新藏、滨田耕作等。其中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对宋史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内藤湖南看来，一方面，宋代的文明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开始衰落也在宋代，这是一个需要理性反思的文化现象和学术悖论，也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刺激了日本学者研究宋史的热情，而20世纪中后期日本学者的宋史研究论著成倍增长，即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确实对日本学界，甚至对国际学界的宋史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研究汉学的热情一直高涨，而此间宋史研究异军突起。1947年5月，旅法的白乐日倡议从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入手，逐步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化的开端。1951年10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正式开始实施“宋史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主要是编纂宋史研究历史手册，共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与年表，包括宋史提要、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中央政府组织系统、地方政

府组织系统及历史地图；第二部分是宋代名人传记；第三部分是宋代书录。在已经完成的著述中，白乐日的《11世纪末的中国商业中心图》，被布罗代尔描绘为“可以设想出来的最令人惊讶的经济图”。由于法国巴黎实施了“宋史研究计划”，欧美有一部分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如德国的傅海波，美国的芮玛丽、柯睿格、梅李景英等。由此，法国的“宋史研究计划”就对欧美各国的宋史研究起到了引领和辐射作用。目前，欧洲各国的宋史研究已逐渐由经济不断向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扩散，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宋史研究格局。

美国的宋史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80年代，但成就不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中心，而杨联陞教授则是这里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本人在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外，他的得意弟子余英时更是叱咤当今国际宋史学坛的一名旗手。与杨联陞教授齐名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他从钻研法律而入门宋史，以《宋代中国的变法》一举成名，是书也因此成为国际公认的宋史权威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宋史研究开始转向地方宗教和政治文化，但美国学者对“宋代近世说”的理性思考并没有终结，在这个问题上，史密斯教授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与内藤湖南相呼应。史密斯教授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停滞。然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影响深远，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所以，如何认识宋代的发展与停滞？这恐怕会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学术话题，而宋史研究的真正魅力亦在于此。

除日本、西欧和美国之外，韩国、新加坡、加拿大、埃及、伊朗等国也有各自相对集中的宋史研究群体，他们也时常在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宋史同道展示他们对宋代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综上所述，20世纪国际风云复杂多变，就是在这不断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学”以她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顶峰，对近代欧洲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始，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先后涌现出了像桑原鹭藏、内藤湖南、埃狄纳·巴拉兹、李约瑟、刘子健等一大批宋史研究的名家和大家。如何将他们的宋史研究成果相对系统和全面地介绍给国内学者，促进国际宋史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毫无疑问，宋史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大趋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学术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宋史研究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不断丰富自己，从

而使我们能够站在宋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制高点上去重新认识自我和发展、充实与提高自我。因此，尽快把世界各国的优秀宋史研究论著翻译、介绍给国内学者，便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目前，国内虽然已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当代海外名著译丛》《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等比较有影响力的汉学丛书出版，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宋史研究论著也已翻译了不少，成绩可观，但由于断代史与通史的区别，用通史的眼界看待宋史，总是不能完整展现国外学者宋史研究的全貌，这对于宋史研究专业的专家和学者来讲，肯定感觉不满足，况且如果不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国外学者的宋史研究状况，那么，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就难以准确判断，从长远来看，它会成为束缚国内宋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基于此，我们决定启动《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宋史研究论著集成（1900—2010）》编译工程，这不仅是宋史研究中心的工程，更是河北大学的一项工程。

截至2016年，河北大学已经走过了95年的办学历程，宋史研究中心也有了34年的学术积淀，尤其是后者从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室，成长为目前拥有30多名教职工的国际宋史研究重镇，成绩来之不易。当然，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史研究中心还有更高的研究目标和学术追求。2015年10月23日下午，时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副司长徐青森一行来到河北大学调研，重点是就宋史研究中心“十二五”工作总结及“十三五”规划制定工作进行专题指导。其中张司长对宋史研究中心的发展方向、重大规划项目的设置及综合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提出了建立“全球宋史研究联盟”的战略目标。为此，宋史研究中心在杨学新副校长的领导下，决定以宋史研究大国的气概，编纂“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宋史研究论著集成：1900—2010”大型丛书。这项工程非常艰巨，不仅牵涉的部门比较多，而且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大，尤其要举河北大学之力，乃至国内外宋史领域、编辑出版界有关专家、学者之力，集体攻坚。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先分批进行，成熟一部推出一部，在积累了一定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同时等待时机，成套或成批推出。

本丛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论著总目”，第二部分为“综合类论著”，第三部分为“专题类论著”（初步分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学、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15类专题），按照甲、乙、丙、丁的形式分10集若干编排序，具体讲，就是依集、编、（一）“论著目录”、（二）“综合类论著”、（三）“专题类论著”，以及册、卷编纂。比如，甲集日本编（一）“论著目录”，甲集日本编（二）“综合类论著”第1册某某卷。

在具体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过程中，河北大学有关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非常感谢！同时，我们也深感工程巨大，责任重大。不过，既然我们有勇气担当，就不畏惧任何困难和挫折。同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一样，这部丛书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希望学界同仁多给我们反馈改进意见，我们将会真诚地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逐步提高编纂质量，以不负使命和众望。

编委会

2017年1月15日

## 编 例

一、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邵茜博士论文《日本京都学派的另类——桑原鹭藏》，得到邵茜的授权；下编收录陈裕菁等译著，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和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日本学者桑原鹭藏的两部论著，以及冯赫阳所译学术论文二篇，得到国家图书馆的授权使用。

二、本书所收论著、论文按其首次发表、出版时间（公元纪年）先后排序，各自编号，上编序号前标“上”，下编序号前标“下”。

三、本书所收论著、论文中有一些与我国现行用法不一致或者不恰当的词语，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将其标注出来，有的进行了修改。文中出现的杂志名称或者学术团体，为保持原有文献信息，本书一仍其旧。

四、本书收录的译著、论文的体例规范录排时尽可能依照原文样式，但其中所引古籍文献名称前后不一致者，一些疑为误字、漏字、衍字、繁难字等亦做出标识和补正，以备读者参考。

# 目 录

## 上编

研究性论著 .....	3
日本京都学派的另类——桑原鹭藏 .....	5

## 下编

第一部分 桑原鹭藏论著 .....	109
甲 蒲寿庚考 .....	110
乙 唐宋贸易港研究 .....	262
第二部分 桑原鹭藏论文 .....	343
甲 东西交通史论丛 .....	344
乙 唐宋时期的铜钱 .....	352

上 编



# 研究性论著